

政治

苏联剧变原因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辩难

王晓敏

【内容提要】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是研究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多年来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存在着诸多说法和争论。就整体来看,探讨苏联兴亡,不能不注意考察“苏联解体”与“苏联剧变”两个概念的含义之别;判断苏联社会制度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是探讨苏联剧变原因的重要前提;对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等人个人历史作用的纠结,正在成为探讨苏联剧变原因难以解开的死结;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是探究苏联剧变原因的核心问题所在;各种争论背后潜在的立场、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方法等问题,是争论产生的深层原因,也是廓清迷雾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苏联剧变 社会主义 斯大林 斯大林模式 历史人物

【中图分类号】D73/7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6-0005-0012

苏联剧变作为20世纪末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近二十年来,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有着相近或相异的众多说法,甚至有不少争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很难取得一致或作出具有广泛接受性的定论。但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结合已有的总体研究状况,对其中一些具有重要影响或争议性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潜在问题,加以梳理和探究。

一、“苏联解体”与“苏联剧变”的含义之别,是探讨苏联兴亡不可不察的基本概念

自苏联发生制度变革之后,人们频繁地使用“苏联解体”与“苏联剧变”等概念用以指称这

一历史事件,有时也会将苏联的变革与此前东欧的变局连在一起称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但总体来看,更多的人习惯用“苏联解体”这一概念来概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和国家分裂这一事件。不少人在总结苏联兴亡和苏共亡党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时,也喜欢用“苏联解体”这一说法,其实这都是值得检讨的。

笔者以为,这种不分场合和探讨的具体问题的差异而笼统使用“苏联解体”这一概念,有失严谨。从一些人对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偏好所致。不少俄国人使用“苏联解体”这个概念,多少渗透着失去昔日超级大国地位的大国情结。一些人使用“苏联解体”的说法,或许是与世界格局中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有关。苏东集团作为两极时期的主角之一,对欧亚地缘政治形势有着重大影响,苏

【作者简介】王晓敏,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教授。

联作为大国而解体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俄政府总理普京曾明确表达过这一意思。但不论怎样，应该说，“解体”与“剧变”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明确的差异。“解体”是就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性而言，是统一与分裂问题；“剧变”是言其社会制度变革之剧烈，这个剧烈变化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在苏联的丧失。国家分裂是社会根本制度变革的结果。二者虽有一定联系，但各自的具体所指还是有所不同，“解体”不足以涵盖国家分裂和社会制度更替等众多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分裂与社会制度的变更相较来讲，其影响力要小得多。因为苏联的宪法和联盟制度的设计本身就隐含了国家分裂的可能性，从法律意义上讲，分裂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作为苏联前身的俄国，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发生了分裂，后来重新统一与革命在全俄的凯歌行进和共产党的作用密不可分。而社会制度的更迭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价值观来讲，都具有颠覆性。可以说，就苏联来讲，国家分裂不一定导致苏共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终结，而苏共垮台和放弃社会主义选择必致联盟瓦解，这是当初成立苏联时的宗旨和联盟制度设计本身就决定了的。联盟是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有其特殊的内在矛盾和维持联盟稳定的因素^①，凝聚各共和国和各民族的是社会主义目标，马克思主义是维系联盟的精神纽带，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及其能否坚持，则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党是凝聚力的核心所在和联盟能否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失去这个核心，放弃社会主义，联盟的瓦解也就可能发生。当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也不是没有国家分裂的可能，但这种情况下的分裂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也不见得其后果就是危害性的。假如当时苏联一分为 15 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不是苏共垮台灭亡，其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震动和冲击恐远不及人们近二十年来所感受的那样剧烈和深刻。对于作为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讲，苏联社会制度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苏联作为中国邻国解体而产生的影响。这也是近二十年来中国人不断研究苏联兴亡和探讨苏共亡党教训的主要原因所在。

因此，笔者认为，从总结苏联兴亡原因和教训这个角度讲，使用“苏联剧变”这个说法可能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恰当一些。

二、判断苏联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探讨苏联剧变原因的重要前提

所谓苏联剧变，从人们在概念使用上较为普遍的意指来看，就是苏联社会制度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变。不管人们基于何种立场，以及怎样探讨和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承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剧变作为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其影响如何，与这一基本前提密不可分。从逻辑上看，苏联社会制度的性质就隐含在“苏联剧变”这个概念之中，也不该存在什么疑义。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前提基础上的。但也应看到，一些研究者对这一前提存在着质疑，苏联社会制度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在事实上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论者认为，苏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认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并给出了相应理由。既然苏联社会制度的性质存疑，那如何认识所谓剧变也就不能不受到影响。正是由于对这一前提的不同认识，有关研究结论也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可以说，对苏联社会制度的属性如何判断，决定着研究苏联剧变的基调，成为探究苏联剧变不能不考察的重要的前提性问题。就已有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肯定其社会主义属性的，一则因属于或是同情社会主义的人士，而怀惋惜、沉痛之情，惺惺相惜，其所叹所思都在谋求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一则因属于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士，而怀对手消失额手称庆的喜悦之情，其所思所论都在论证社会主义灭亡的历史宿命和与之对立的社会制度的普世意义。否定其社会主义属性的，将其灭亡视为理所当然，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甚至认为这是国际共运的高潮而非低潮。

^① 王晓敏：《苏维埃联邦制探析》，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事实上,关于苏联社会制度的属性如何,在苏联生前身后一直就有不同看法和争议。在战后国际共运发展的一度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属性遭到过相当强烈的质疑,最典型的当是中苏论战时期加于苏联的“修正主义”定性,以及后来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论断,这些定性和论断也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思想一定理解的基础上的,不是毫无根据的。在中国以外,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一些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也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作过不少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属性的意味。在苏联国内,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明确说过苏联实现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模式。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曾对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进行过种种批评和攻击,其矛头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向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对苏联社会属性的质疑,不仅来自各色政治人士,也来自一些普通人士。在20世纪60年代,几个普通人所写的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小书,就曾流行过相当一阵子。尽管从今天来看,其所述迎合了当时的某些需要,有不少牵强之处,但其提出的问题仍有再予思考的必要。这些表明,怀疑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由来已久,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国际共运中的论战和相互指责逐渐停止,承认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模式,但并不意味着关于苏联社会属性的一些论断或看法被彻底改变。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苏握手言和恢复正常关系之际,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时虽然承认双方论战时都说了许多空话,中国并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但没有明确说中国曾加于苏联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等错了,要收回或改正。他在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甚至还说苏联搞了很多年并没有搞清这个问题。这些说法虽不等于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属性,但也不是没有怀疑和保留。可见长期以来,在国际共运中苏联的社会属性问题并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不影响到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

苏联剧变之后,我国国内也有不少人从不同方面对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提出质疑。一些人认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化的理解,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不符合马恩的本意;一些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许多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乃至封建的东西存在,是“军事封建社会主义”、“带有红色印记的赭色社会”^①;一些人明确断定“生存了70多年的苏联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马恩所批判的“臀部带有封建纹章”的封建社会主义^②;一些人认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是假社会主义,有人甚至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是假社会主义;一些人将苏联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认为从赫鲁晓夫起的后一阶段逐渐背叛社会主义而成了另一种资本主义,提出研究苏联剧变和苏共垮台的原因首先要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③;一些人甚至认为马恩并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所杜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有许多是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导者^④。一些人虽然以斯大林去世为界将苏联分为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前后两个阶段,但另一些人则从斯大林模式和体制的延续性角度认为后一阶段各种问题如霸权主义等的根源在前一阶段,因而这在逻辑上对前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属性也就提出了质疑。

在国外,除了西方人从其立场对苏联制度的指责外,出身于原苏东集团的一些政要今天也以不同方式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普京曾认为苏联近七十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政权是极权政权。一些原苏东国家的学者也有苏共蜕变和修正主义路线等说法。这些说法等于间接地否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属性,或是对斯大林之后社会主义属性的直接否定性判断。

这些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不同看法,实际上也是在分析和评价苏联剧变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

^① 高放:《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军事封建社会主义——俄国近五百年的历史脉络透视》,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② 刘建明:《〈共产党宣言〉的误读与误读苏联》,载《北京观察》1998年第9期。

^③ 李慎明:《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专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绪论》,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特刊(3月)。

^④ 何伟:《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的分歧所在，既涉及如何分析其原因，也关系到其历史影响究竟是“倒退”还是“促进”。也充分表明，对于苏联社会制度的属性，至今仍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尽管在这一问题上相当一段时期内可能很难取得共识，但这一问题本身确实直接影响着对苏联剧变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在众多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争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剧变之前，苏联饱受世界范围内共产党阵营的指责，加于其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等种种恶名，中国等反修国家指责他，欧洲共产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也批评他。而在其垮台之后，却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来祭奠。有不少共产党和同情者甚至是曾经的批判者，都为之惋惜，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巨大挫折、灾难等，并因此担心社会主义的命运。这前后两种态度实际都牵涉到社会制度的性质，究竟孰是孰非，值得琢磨。这一现象与当年南斯拉夫脱离苏联控制之后被苏联指责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时隔几十年其发生制度变革之后（南联盟）又被西方国家指责为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何其相似？

通过对各种说法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关于苏联社会制度属性的判断，实际上反映着（或潜藏着）人们立场的不同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也必然有着不同乃至大相径庭的基本结论。在种种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属性的观点中，苏联剧变之前的各种评判，虽不尽恰当，但就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来讲，体现了敢摸老虎屁股的勇气；而苏联剧变之后的各种否定其社会主义属性的评判，虽有助于更全面认识苏联的社会属性，但有一种打“死老虎”的味道。

三、对个人历史作用的纠结，正在成为探讨苏联剧变原因难以解开的死结

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人们往往会由现实而追溯历史，又从历史事件和重要活动而追究到人。尽管不少论者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原因，不是个别人的责任或罪过。但历史人物

作为一段历史的符号，往往会被置于显要位置而追究其作用和责任。这在苏联剧变这一问题上显得相当突出。应该肯定，历史是人的历史，探讨苏联剧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必然涉及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评价。但自苏联剧变以来，关于苏联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剧变中的作用，一直纷争不断，结论迥异，纠结很深。这集中体现在对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的不同评价上。论者往往各执一词，或为斯大林叫屈，或为戈尔巴乔夫开脱，其结论或论断的背后实际都体现着论者的立场，并非提几条评价标准那么简单。对斯大林的评价自斯大林去世后就一直争议不断，苏联剧变之后又再掀波澜，并与对戈尔巴乔夫等主要当事人的评价叠加在一起，变得更为复杂，负面评价有增多之势。就论争者的观点差异及其态势来看，大有成为探究苏联剧变原因中的死结之势。

主张斯大林应为苏联剧变负主要责任者，往往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基本体制和社会主义模式在几十年演变中，积重难返，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端，其最终崩溃也就是必然的，并非戈尔巴乔夫断送了苏联。苏联剧变不是个人的罪过，而是其不人道、违背科学社会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有别的人扮演其角色，苏联剧变的根源在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这种说法实际上把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简单化为某种宿命，历史人物则成了接受某种宿命、无所作为的奴隶。同时也如反对者所指出，没有在对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上采用同一标准。主张戈尔巴乔夫应为苏联剧变负主要责任者，大多对此前苏联社会发展尤其是斯大林时期作了相当积极的评价，认为戈尔巴乔夫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叛徒”，其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斯大林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两个阶段社会发展的成就与衰败的比较来进行，认为剧变是否定斯大林之风不断发展的结果。但持此说者大多也没有很好地说明斯大林时期的弊端对后来的消极影响如何持续及其对于苏联剧变到底有何作用，没有说明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与斯大林所创立的体制的关系，没有说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背叛为何能够得到公众的接受而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抗议。这两种观点的论者，都会给自己的批评对象罗列种种“罪状”，

或指斥斯大林埋下的“祸根”，或揭露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以证明己说的合理性。与此相应，也各自提出为斯大林或戈尔巴乔夫辩护的不同理由。总体来看，两军对阵之势相当明显。

除了这些截然对立的观点外，也有一些论者试图跳出这种对阵，提出了新的思路，其基本倾向就是对斯大林不作一般性的总体评价。一些人认为重要的是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而不是评价其功过；一些人认为可以把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分别作出评价。一些学者还提出具有创意的“两个框架五个层面说”，即对斯大林从国家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师和国际共运领袖两个框架评价，其错误可从思想作风、方针政策、发展战略、理论观点、具体体制五个层面去概括^①。普京在回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时也曾明确表示对斯大林不能进行总体性评价，他的评价也是就具体事情来进行的。这些有所区分的思路和做法虽有一定启发性，但不占主流地位。就人们的习惯来看，也很难摆脱“总体评价”的思维模式，一些学者也主张应该有一定的总体上的评价^②。把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分开评价实际上也很难做到。

时至今日，各种争论还在持续，各自也都在通过更多的历史的或新近的材料来论证，也会不断去发现新的材料作为依据，因而争论也将持续下去。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的立场，也与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有关。论者们虽各有所据但结论不同，实际上纠结的是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等重要关系如何理解和认识，许多论者往往是把有关理论简单化、片面化，把领袖人物的某些论断教条化。直言之，近二十年来的研究不少，但真正在思维上和方法上经得起推敲的并不多。大多数评价很难说是真正体现了历史的态度。

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主体活动的历史，历史活动也是人的选择的结果。每一代人创造历史的活动，都受其从前一代人所继承的客观条件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但每一代人对其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和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和适应，而是有所选择和创造。历史运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过程，必然性的链条中也镶嵌着一个个偶然性的环节。历史选

择活动体现着一定的大众要求，也渗透着历史人物的意志，打着很深的个人烙印，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种个人作用会更明显更突出。如果说是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那么英雄的作用则往往是显性的。这些道理，可以说在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家那里和经典文献中都是相当明确的。但在对其理解、领会和实际的运用上，往往不难发现某些实用主义的倾向，各取所需，割裂某些重要关系，作出片面和极端的理解。由此，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必然性被视为某种机械运动的宿命，人成了历史运动的工具，不是拔高历史人物指点江山的作用，就是视其为历史规律的奴隶。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批评过的，牺牲正题或忘记反题而未将其中的真理因素统一到合题之中。这也正是多年来在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中，关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评价上争执不断的方法论根源所在。

从多年来的争论中可以看到，论者们虽都执守一定的理论和事实依据，也都有一定的“真理因素”，但缺少的是经过统一的“合题”，或是对合题科学合理的阐释，缺乏全面性、辩证性。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在历史关头的作用，而是怎样看待历史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他与特定历史事件的关联度如何。能否把历史人物置于其所处阶段的历史场景之中，真正揭示出当时历史运动真实的而非虚幻的、实质的而非表象的必然性，和它所要求的需要历史人物去解决的课题，及其对人的要求。而不是把对历史人物的作用和评价，建立在以苏联灭亡这个现实结果去推论其历史“原罪”的基础之上，以及今天人们所形成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只有明确了某一历史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与历史发展方向的关系（促进还是促退），全面把握了历史人物在其所处社会和时代中的“历史担当”，才能奠定评价历史人物的基础。以成败论英雄和把现实等同于历史，都是片面的。

在探讨和追溯苏联剧变原因的各种观点中，有人强调体制，有人强调党，有人强调领袖个人。

① 高放：《重评斯大林之我见》，载《北京日报》2006年7月10日。

② 俞邃：《评价斯大林》，载《当代世界》2003年第4期。

这实际是一个体制、执政党、领袖个人三者的关系问题，三者相互作用，个人是最活跃的能动因素。应该说，体制是人建立起来的，体制又造就和制约人；体制是执政党为实现其价值追求、奋斗目标和执政宗旨而建立的，党的活动又在体制内进行；党要造就自己的领袖人物来领导，领袖人物对党的发展又有重大影响。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实际是一个循环互动的过程，但核心是人，体制和党的作用，最终取决于人。而目前关于三者苏联演变中作用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其相互割裂的结果，也因此对于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等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失公允、全面。强调体制作用的论者，认定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现斯大林模式的体制问题，党的问题只有从体制中去考察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是这个体制的产物，戈氏或其他什么人都无法挽救这个体制。常以邓小平关于制度问题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和稳定性的有关论述为理论依据；强调党的作用的论者，以苏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明其思想理论和路线对于社会发展导向的根本性作用，认为问题就出在党内，亡党必然亡国。他们也引用邓小平晚年关于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等论断增强其说服力。强调领袖个人作用的论者，从人对体制的能动作用出发，认为苏联的体制作为苏联剧变的根源，是斯大林领导建立的，斯大林应为剧变负主要责任；或者认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届领导人的“背叛”具有根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同样会引用邓小平关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人、组织路线对政治路线的保证作用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有关论述，作为重要支撑。这些说法，虽都包含真理性因素，但都有失全面，也没有解决“合题”的问题^①。我们在肯定这些说法的某些合理性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一是，斯大林之后几十年，苏联为什么长期没有产生具有雄才大略的使国家中兴的时代巨人，恐怕还是其体制的问题。就体制来讲，苏联在斯大林之后随其弊端的日益严重而需要改革，也必然有着与这种客观的社会需要相应的对于领导集团及其领袖人物的要求，具有相应才能的人也不会没有，但这种人物能否被发现并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与现存制度是否阻碍或能否为

其提供道路密不可分。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直至戈尔巴乔夫等等，都未能有效地担当起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被一些论者指为“背叛”，可为什么这些人物都不堪重任，恐怕就在于体制没有为时代需要的人物的出现提供道路，而这些“背叛者”的登场也就堵塞了其他可能性的实现。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其上台和下台的方式都充满了诡秘性，一些重大问题也是以异常的方式解决，如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②、“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宣告苏共解散等等，都是令世人震惊的爆炸性事件，这不能说是体制运行的常态及其健康发展的结果。二是，苏联的体制从何而来，为了什么，为什么长期没有革除其弊端，这恐怕还得从作为领导核心的苏共的状况去认识。任何制度和体制都不是无目的的，凭空产生的，不是尽善尽美的，也都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苏联的体制，是在苏共领导和主持下建立的，无论其创立还是要求对其改革，都是为了党的事业，确立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并不只是单向的受制于体制，而是决定着体制的命运，只有党才能对这个体制如何发展作出根本决定。对于斯大林时期创立的体制，究竟该怎样改革，考验着党的智慧。党如何认识和决策，也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斯大林之后改革的失败，恐怕首先应该从苏共的演变方面作出检讨。三是，苏联的体制为什么不能保证苏共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强化，党所领导的改革为什么最终埋葬了自己，恐怕又需要从人的能动性上去考察，探究苏联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家，其相应的历史任务和责任是什么，完成和落实程度如何。任何政党，不论是所谓的群众党还是阶级党，都有其领导集团和领袖人物，任何国家的治理都需要领导者和政治家。领袖人物和政治家的作为，对于政党的兴衰至为关键。列宁曾对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作出过

^① 就笔者所见，只有个别学者对人与体制的关系作了明确阐述，但也不够全面。参见李慎明：《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②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根据俄国有关档案，对秘密报告形成的过程作了新的考证，一些学者认为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自作主张，而是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意并形成了完整翔实的书面报告，报告文本也征求过高层其他人的意见。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报告不具有合法性，有不合程序之处。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及中国的反应》，载《百年潮》2009年第8期；李卫红、徐元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并非赫鲁晓夫个人之作》，载《学习时报》2010年12月27日；《俄学者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无合法性，是反党产物》，凤凰网-历史频道，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9/01/2401326_4.shtml。

深刻论述,领袖是领导政党的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领袖不仅掌握着政党乃至国家的核心权力,而且承担着治国理政的重大责任,对于政治管理负有统帅和驾驭之责,也以其思想和创造才能的发挥,影响着社会发展。领袖和政治家既要顺应社会发展要求肩负起历史责任,又以其才能的发挥引领和改造社会,其责任的担当既需要守成,也需要创造。在既定的制度和体制面前,政治家和领袖人物并不是无所作为,社会发展要求于他的,或是他能否延续和发扬制度或其创始者的优良传统,或是破旧立新,取代旧的制度和体制。以此来看,列宁、斯大林在苏联体制创立之始,奠定了什么样的传统,其后的领导人继承和发扬了什么,有何创造,其活动是否利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对于分析其历史责任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从中也就不难发现对于党和国家兴衰的影响如何。只有对体制、政党和领袖个人的关系作出系统的辩证的分析,并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才能对历史人物个人的作用和责任作出合理的评价。否则,难免从个人的好恶出发,或是陷于盲人摸象式的荒谬,或是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谓争论。

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评价,是探究苏联剧变原因的核心问题所在

探究苏联剧变的根源,无法绕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几十年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尤其是对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评价,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也往往聚集在此之上,由此展开了最近二十多年来所称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持续讨论与论争。有关苏联历史研究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争议都与这一问题有关,前述关于苏联社会制度属性的判断、对斯大林的评价,实际也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因而,可以说,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或者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探讨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争论所在。有学者明确指出,“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成为讨论苏联演变原因问题时争论的焦点”^①。

总体来看,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和争论已

持续多年,观点纷呈,但核心问题在于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和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两个基本方面。就前者来讲,各种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斯大林模式究竟是不是苏联剧变的主要根源。一些论者对此作了明确的肯定回答,认为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病根病源所在;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作了多方面的辩驳。就后者来讲,各种争论的焦点可概括为对斯大林模式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是坚持苏联模式的基本原则还是突破或抛弃它,实际也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定性、定位及其历史影响的基本评价。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坚持与抛弃的观点并存,也有一些论者对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两种极端倾向提出批评,认为斯大林模式成就与局限并存。

在这些基本的分歧中,又涉及对斯大林模式的界定、它与马恩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及对其功过与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认识,涉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究竟是教条式的还是从当时苏联的实际出发,体现了苏联的特点,甚至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同样有着诸多分歧,大致也呈两军对垒之势。

透过这些问题的分析和争论,也可以看出,如何认识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是与对斯大林模式的定性、定位这一基本评价相联系的,其态度与回答大致也是基本对应的。肯定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否认它是苏联剧变的主要根源;反之,否定斯大林模式的,无疑将其视为苏联剧变的主要根源或根本原因。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与人们对马恩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即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观念直接相关。围绕苏联社会制度的属性、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所产生的争论,在事实上也折射了人们社会主义观念的差异。一些论者追溯历史,对中苏论战时期的某些论断作了肯定,另一些论者则对以“九评”时期的理论和认识作为评价标准表示不能接受。可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今天依然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① 周新城:《苏联解体留下了什么教训?——读彭真同志一次谈话有感》,载《中华魂》2010年第12期。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对于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试图在思维方式上作出改变,或从一些新的视角作出尝试。诸如提出从根本性质与具体实现形式、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机制等不同层次去分析,或是注意斯大林的错误与斯大林模式的区别,或是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去认识,等等。这些不同意义上的区分,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有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纠补某些偏颇有所启发。当然,这些思路,各自也都是在一定的争论背景下提出的,有其针对性,论者的立场是明确的,首先是表达自己观点的需要,但其中一些观点还是受到质疑。因此,关于斯大林模式及其与苏联剧变的关系等诸多争论,不仅是思想、理论观点的分歧,也反映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评价斯大林模式,应该坚持历史的态度,这是许多论者都承认和强调的,但争论的持续表明如何坚持历史的态度仍是问题所在。笔者不否认已有研究中的一些可取之处,但就历史分析中存在的问题来看,觉得有必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是将斯大林模式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认识,从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去认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在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苏联国内外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解的比较中,去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和各种可能的备选方案去把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如何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和诠释的流派,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当时与其他流派和党内其他人的社会主义观并存的情况下,作为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也是有着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客观条件的,不是权力斗争所能简单说明的。如同任何历史选择活动都有其利弊和相应的代价一样,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初创时期,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也已证明有其不足和缺陷,乃至严重错误,但不能因此证明其他的选择可能性就是最优选择,是完美的。实际上也不存在最完美的制度和模式。开创者难为功,人们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有各种批评,从情感上讲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缺乏历史的、理性的分析,拿今天的标尺去苛求前人,恐怕是一种企图逃避当代人的历史责任的惰性思维。关于斯大林模式

的成因已有很多探讨,一些论者虽也强调其原因的复杂性,认为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但把斯大林的主张在党内逐步取得主导地位 and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更多地归结为权力欲和权力斗争,恐怕也有失偏颇。

二是从今天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观念和认识水平去回顾和反思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实践模式。但要注意的是,今天的回顾与反思并不是为了嘲笑前人的幼稚,为了证明当代人的高明,而是对其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作出合理的定位。应当看到,从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的实践都与马恩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从其所处时代和苏联的国情来讲,也都与马恩有所不同。随着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共处竞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等,使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都有了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变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发展。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样态。从今天来看,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种种曲折和战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与比较等之后,不难发现斯大林模式的种种缺陷,也不难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有许多文明成果值得借鉴和吸收,从而使列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这一公式可以不断延长。但在那个时代,斯大林模式也有其划时代意义和优势。在当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能爆发革命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文明水平较低的国家如何变为现实,是重大的时代课题,斯大林模式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实现形式等方面,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探索,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它在推进苏联社会的现代化和实现社会跨越式发展方面的成就也是明显的。只要不抱偏见,当时许多人都是把苏联当做一种新社会来看待的。即使今天一些人将其称为军事强国主义,也没有否认其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优势。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之所以有很大发展,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后近百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曲折之后才取得的,没有斯大林模式,我

们的认识不可能比前人深刻。但以今天的眼光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史上的另类或异端,恐怕也不是历史的态度。

三是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进程中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过程,实际也是它与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而走向民族化和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结果。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与各国特点相结合走向本土化和民族化,作为一个新的课题紧跟而来。此时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比革命时期更为复杂和艰辛,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既有许多新的创造,也有不少失误。也可以看出,实践向人们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实现面临不少挑战。列宁之后,斯大林实际上继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斯大林模式就是这种探索的体现和结果。尽管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解与列宁有所不同,对列宁时期的某些政策和做法有所改变,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今天被认为有不少缺陷,但不能说就是偏离了当时的时代课题,抛开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尤其从社会主义的实现角度讲,实际是从苏联开始的,在相当长时间也是由斯大林领导来进行的,二战后才在更大范围进行。这在今天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后来看,应该是明确的。尽管斯大林时期曾经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而向兄弟国家推广,在主观上没有明确承认各国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模式或多种模式,没有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但它作为社会主义在一国范围内的第一个实现形式,客观上成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第一个样本。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正是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需要再本土化,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其他模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需要把握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代特点和世界形势、本国国情等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至今看来,要解决好很不容易。这实际也是研究和评价斯大林模式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关于斯大林模式与马列思

想、国际环境、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尤其是斯大林模式是否教条主义、是否脱离国情等,实际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这既要从当时的历史阶段来分析,也要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来认识。简单的指责其为教条主义和脱离国情,在逻辑和事实上恐都难以成立。一些论者把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方方面面,都与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论断如“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等简单对照,而指责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这种思维恐怕也有教条之嫌。如果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那么所谓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国际共运的挫折与低潮,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又从何谈起?如果斯大林模式完全脱离国情,那一些学者说它是“军事封建社会主义”等等,又该怎样解释?问题恐怕在于它体现了什么样的国情,如何体现国情,而不是有无体现。

历史地分析问题是必要的,但如何历史地分析,恐不能不论。至今看来,要真正坚持历史的态度并非说起来那样简单和容易。

五、揭示争论背后的潜在问题,是廓清迷雾的根本所在

对苏联剧变原因的探究,纷繁芜杂的种种观点和不断的论争,即使人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的多面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认识一个真实的苏联及其演变蒙上些许迷雾。廓清迷雾的根本,可能就在于透过各种争论而揭示其背后的潜在问题,也即争论产生的深层原因。

各种争论不断产生,实际上已远远超出问题本身。苏联剧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具有世界性政治意义的事件,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当今时代的特点,对其研究和探讨已超出事件的过程和事实,不是一般的学术探讨。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虽有种种说法和分歧,但争论不休的莫过于对历史人物作用的评价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透过争论中的各种说法,可以说在基本观点上很难取得一致,争论也还将持续下去。从争论中也可以看到,不少论者都是各执一词,能够找到自认为说服对方的有力证据,但实际效

果并不是各自所希望的那样。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立场和价值观的分歧所决定的，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等所决定的。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皆由此决定。尽管许多讨论总体上还是在学术的范围内，但学术分歧的背后也不是没有一点政治意味。从中国以外看，无论俄国还是原东欧国家，还是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苏联剧变这一问题上，都有着左、中、右的大致分野。而在中国，虽然还很难套用西方化的政治色谱，但论争中的立场和观念分歧还是或隐或现的存在的，这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是没有影响。而就方法来讲，尽管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研究苏联剧变和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原则和基本方法，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唯物史观、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问题、阶级观点、注意分辨主次矛盾和内外因关系等等，甚至在一些重要争议问题上具体阐述了“应当如何分析”及其结论。一些论者在论辩中也会指出对方的逻辑和方法局限，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法，但自己也往往陷入某种局限或另一种局限。因而，多年来各种争论的产生和持续，除了立场和价值观的分歧之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的问题，就国内来讲，这些问题，最主要的可归结为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从中国的现实需要比照苏联。中国学者总是从中国的某些现实需要出发来分析苏联的问题，如关于经济落后、计划体制、党的建设等等，从这些方面分析苏联做得如何不好。或是作一些成败得失的比较，如将科学发展观与斯大林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进行比较等，以中国的成功来说明苏联在相应方面的失误和缺陷。我们不能说这种视角没有道理，但都是基于中国的经验和现实需要来进行的，中国的特殊性也不能忽视。这种直接或潜在的比较，未必能抓准苏联的问题，因为这些在中国突出的问题，对于当年的苏联来讲，未必都是同样突出的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国内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把苏联演变当做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和各个领域正面经验的反证去研究的现象”^①，而这往往易使研究限于表面，难以探究深层问题。

二是研究历史缺乏历史的态度，以成败论英雄，责难历史，陷于片面。苏联和苏联剧变都已

成为历史，研究苏联剧变也应该具有历史的态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虽是不少人都主张的，但实际中的问题并不少。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多不能从当时整个世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水平来进行，而是建立在今天已有的认识上，有一种“事后诸葛亮”倾向，或以成败论英雄。以苏联后来的衰亡否定其早期的功绩乃至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而肯定其灭亡的必然性。关于苏联剧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对历史人物作用的评价等，都失之于片面性。不少论者似乎格外重视运用历史必然性来分析苏联演变，但其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未必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精神。一些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是以往僵化的哲学教科书中的诠释，把历史必然性等同于决定论和宿命论，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与个人的作用等等简单化。他们一方面把苏联剧变归咎为斯大林模式演变的必然结果，强调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和活动具有某种确定的必然性，甚至将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归结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结局；另一方面却把斯大林取得领袖地位及其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更多地归结为个人因素和权力斗争，甚至把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出现视为不合历史规律的早产儿，等等，而强调其偶然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似乎成了表达个人需要而随意使用的工具。这种思维，恐怕很难说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正如有论者指出：“认真检讨一下我们多年来的理论研究，固然能够发现由于否定决定论而倒向非决定论、倒向唯心主义的倾向性问题，但更不乏由于固守决定论而走向机械论、预成论的大量事例。”^②这虽是就历史哲学的一般理论讲的，但用在当前关于苏联剧变的研究上，也是很恰当的。

三是引用资料各取所需，实用主义，缺乏应有的分析。理据结合是研究问题的基本要求，人们在研究问题时也往往非常重视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以获得必要、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但各种争论的产生，也与如何引用资料密切相关。在

^① 刘昉献：《对 10 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评析》，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

^② 张曙光：《从历史决定论到历史选择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再认识》，载《学术月刊》1995 年第 4 期。

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中,不少纷争也与此有关。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论者引用资料表现出实用主义,各取所需,缺乏应有的分析。一些论者经常以某些思想家和领袖的言论、以往和当今政要的言论、苏联和当今俄国一些民意调查、著名学者的看法等,作为阐述其观点和说服他人的重要依据;另一些学者又往往可以在同样的方面,罗列另外一些资料,以说明相反的观点或提出商榷。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各自不同程度缺少了对资料的应有分析。如对邓小平关于制度、人及政党的作用等言论,有的强调制度具有根本性,有的强调关键在人,有的强调关键在党;对邓小平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有的引用偏于学习和借鉴方面的言论,有的引用偏于批评方面的言论,甚至进而认为邓小平对斯大林模式做过不少否定的指示(这未必符合邓小平的原意)。同样是援引邓小平的言论,说明的道理却有不同,就在于邓小平的不同言论,满足了不同人的需要,是不同的人各取所需,而没有对其予以全面把握所致,或是作了偏离本意的理解。

诸如此类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在对原苏联和后苏联时期一些重要人物言论的引用上,戈尔巴乔夫、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言论受到特别关注,但都只注意其表面言辞,而忽视了言辞背后的东西。只注意其说了什么,而不注意其为什么这样说或没有说什么。一些人把戈尔巴乔夫在剧变后的一些言论作为其搞垮社会主义的坦白和证据,却没有注意戈氏前后地位的变化和处境的不同,以分析其某些言论的用意所在。引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等当今政要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性言论,而不分析其作为苏联剧变既得利益者的地位,等等。这样引用难免削弱其说服力。

同样,在对当今俄国一些公众言论、民意调查和一些著名学者言论的引用上,不加分析的情况也有不少。论者们往往会从中找到于己有利的言论或民调数据,却忽略了公众心理和民调本身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许多潜在因素,学者的态度也会有变化。事实上,公众的构成是复杂的,人们对苏联历史和当今俄国现实的心态更是复杂的,各种民调和访谈能说明某些问题,未必能说明另一些问题。当今一些公众言论,并不能表明当年亲历剧变的普通大众当时的心态,所谓此一时彼

一时。一位当年的苏共党员、当今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就曾表示,苏共垮台时他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但后来常怀对国家和民族的负疚、负债、负罪之感^①。这种感受和认识上的变化,不能说普通公众中就不会存在,但却是一些民调难以反映的。这样的复杂心态,在公众中的实际状况如何,恐又不是那么容易全面掌握的。一些人引用苏联时期一些著名学者著述中的资料和看法,证明其观点,尤其是在分析和批判斯大林时期的弊端时,往往会引用一些过去持不同政见的学者的见解,如罗伊·麦德韦杰夫关于批判斯大林的一些说法。却没有注意到有些学者在苏联剧变后关于苏联制度和斯大林的看法已有所变化。

凡此种种表明,研究苏联剧变,既需要充分的资料,更需要对资料的引用采取谨慎的态度,予以合理分析,经得起推敲。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是一些研究中或隐或现、或多或少渗透着一些政治派性遗风,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尽管苏联剧变是政治性的历史事件,研究苏联剧变的原因也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但作为研究,毕竟主要还是学术讨论,即使有争论也不应该是政治论战。但在我国的研究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问题往往有政治化的危险。一些人避免不了曾经普遍存在的政治派性思维,动辄上纲上线,给对方一顶政治帽子。尤其是当今改革成为潮流的形势下,总是以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为界线,随意派发“左倾”、“右倾”或改革与保守等帽子。这在许多学科中都有表现,在苏联剧变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些否定斯大林模式的论者认为理论界出现了颂扬斯大林模式、否定改革的论调,把对斯大林模式的肯定与否定改革联系起来。与此相反,肯定斯大林模式的论者,则认为有些人想通过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走上苏联剧变的道路。论者往往会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些言论,作为重要依据。一些学术刊物在编发有关文章时,不仅表明了其倾向性,甚至在按语中也是拔高调子,上升

^① 李慎明:《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专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绪论》。

到某种政治高度。这种随意上升问题，动辄将自家的立足点设定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给对方扣帽子，靠某种话语权压人的做法，就使得所讨论的问题失去了学术意义，成为不容讨论的需要“保持一致”的路线问题。挟势压人，而非以理服人。这与多年来一些人在改革问题上以所谓左右、保守激进等划分派别的做法如出一辙，引经据典，拿领袖人物的个别言论给自己壮势，拉虎皮做大旗，论者俨然真理的化身，大有剥夺他人言论权利之势。这多少有点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与多年前的政治派性及其文风有一定相似之处，而非学派风格。改革以来，我们许多人习惯了善于“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习惯于寻找和发现“别有用心”之举，也养成了“保持一致”的政治敏感性，但常常忽视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也会有某些危险和危害。即使从党内生活来讲，“保持一致”也并不禁止个人“保留意见”，为什么听不得不同声音呢？何况许多问题都是学术问题。我们不少

人对于苏联历史上一些学术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政治干预学术的教训有深刻体认，可在我们这里总要对一些学术问题保持相当的政治敏感性，这恐怕很难说是真正吸取了教训。

近二十年来，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纷纷扰扰，原因固然复杂，但以上几点也不可不察。

苏联发生剧变已近二十年了，苏联已成为历史。但多年来关于苏联剧变的研究，依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问题，纷争不断。不同的人都有研究这一问题并表达其观点的权利，要求不同立场的人达成一致也是难以企及的。在一定意义上，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态度和方式，可能比提出某种具体观点更具根本性；重要的不是什么人在研究，而是他为什么研究和怎样研究。在总结近二十年相关研究的状况时，对各种观点的梳理固然重要，但对各种观点背后的根源及相关问题也不可忽视，这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责任编辑 李淑华）

A Retort on some questions in the Area of Researching a Drastic Change of the Soviet Union

WANG Xiaomin

Abstract: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a drastic chang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researching the Soviet Union's drastic change. For many years, there have been a variety of arguments and debat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drastic change. Exploring the Soviet Union's rise and fall as a whole, one cannot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meaning of the two concepts the "Soviet Union's breakup" and the "Soviet Union's drastic change". To sit in judgment on whether the Soviet Union's social system is of a socialist nature or not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its drastic change. Entangling the historical role of Stalin and Gorbachev is becoming a fast knot difficult to untie in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Soviet Union's drastic change. How to assess the Soviet Union's socialist mode or Stalin mode or Soviet mode is an essential question in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Soviet Union's drastic change. The potential standpoints, values and thinking ways and methods behind all kinds of debates a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produced by disputes and also the roots to clear up mist.

Key words: Soviet Union's drastic change; socialism; Stalin; Stalin mode; historical figure